



战火中的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三省的文化研究

叶志良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15JC110）

战火中的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三省的文化研究

叶志良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火中的文化: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三省的文化研究/叶志良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677-8685-1

I. ①战… II. ①叶… III. ①抗日战争—文化史—浙江②抗日战争—文化史—福建③抗日战争—文化史—江西 IV. ①K2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6289号

书 名: 战火中的文化: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三省的文化研究
ZHANHUO ZHONGDE WENHUA
——KANGRI ZHANZHENG SHIQI DONGNAN SAN SHENG DE WENHUA YANJIU

作 者: 叶志良 著

策划编辑: 黄国彬

责任编辑: 张宏亮

责任校对: 王瑞金

装帧设计: 黄亚玲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路501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8/29/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 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 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7-8685-1

定 价: 5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绪言

XUYAN

—
LE
i

战争版图中的战时东南三省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原有文化中心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像北平、上海、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纷纷陷落,我国的抗战文化运动版图大体上形成了三大板块、多个中心。第一大板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文化,以延安为文化中心,同时又有较小的文化中心,如八路军活动区域的晋察冀文化、新四军活动区域的苏中皖南文化等。第二大板块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文化,以重庆为文化中心,又有昆明、桂林等地规模相对小些的文化中心,东南地区的文化也包括在这一板块之中,其中有金华、永安、赣州等地。第三大板块是沦陷区抗战文化,以上海“孤岛”为代表,也包括东北、台湾及其他沦陷区开展的文化活动。在战争文化版图中,各个文化区域和文化中心并不截然分割、各自封闭,由于同一的抗战目标,它们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躬临东南文化运动的邵荃麟指出:“今天的抗战是持久战全面战,在这个战争中间,中国将出现若干独立的抗日战区,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建立它的文化中心,然后才能使文化配合着政治而进行,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启蒙运动获得胜利的发展。”^①著名作家姚雪垠在谈到文艺工作者必须适应抗

① 邵荃麟:《文化的黑暗与光明》,载《战时生活》第2卷第1期(1938年)。



战火中的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三省的文化研究

战新形势时也指出：“战争改变了一般的国民生活，也改变了作为文化战士的作家的生活。……战争一方面破坏了上海和北平两个文化中心，一方面也打破了作家们活动的狭隘天地，把他们送到前线、后方、新生的地带和落后的穷乡僻壤。”^①于是，文化人走出大城市，走向山野乡村，走向部队前线，用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向民众普及文化。郭沫若在总结三年文化战的经验时，特别对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社会科学家走到抗战第一线，“走向军队，走入乡村”、“浩浩荡荡的使文化力量弥漫到了全国”，表现出由衷的惊喜，称这是“中国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文化战线更显出了刚健雄伟的姿态”^②。

战争版图中的抗战东南文化，属于国统区文化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言的战时东南，是指在具体战争环境中的一个特定的地域概念。从习惯上来说，战时东南地区是指东南沿海各省及部分毗邻省份，包括苏、沪、浙、皖、闽、赣诸省市。但抗战爆发后，随着淞沪战役的失利，日寇相继侵占了沪、宁、杭等大城市及所在地区，东南地区很快以钱塘江为界被割成两块：以北的苏沪皖地区基本沦为敌占区，以南的浙江大部与闽赣两省及皖南地区，就是国民党统治区域。所谓战时东南三省的文化，就是指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东南半壁”的抗战文化活动。这一抗战文化活动包含着反侵略斗争的现实要求与新启蒙运动重建国民文化精神的双重使命。一方面是结合战争的轰轰烈烈的抗战民众宣传活动，在文艺领域创作出一批切合实际的现实主义作品；另一方面针对抗战提出的诸多文化问题，对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开展广泛的研究。注意抗敌宣传与文化建设并重，从而把抗战文化推向深入。文化活动的盛况自不待说，广泛讨论文化问题也蔚为风气。如战时东南三省的《东南战线》、《浙江潮》、《改进》、《现代青年》等刊物，都把文化建设奉为办刊的重要宗旨。《文化战士》提出，要同敌人“企图毁灭我们的文化”针锋相对，“创造更广大的新的文化基础”，“让我们在这时接受旧的遗产创造出新的科学、哲学、艺术——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来适应中国的需要”^③。《改

① 姚雪垠：《论目前小说的创作》（1944年），《小说研究史料》第92—93页。

② 郭沫若：《三年来的文化战》（1940年），《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③ 《论文化战士——作为创刊的献词》，载《文化战士》创刊号（1939年）。

进》则认为应“将抗战工作与建国工作同时推进”，“文化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宣传民众，教育民众”，但“同时决不忽略各种专门学问的研究”，以期使中国在思想学术方面迅速赶上世界文化先进潮流^①。东南三省抗战文化向深层次突进，不但出现了抗战文化宣传活动的热闹场面，而且还使得文化研究得以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和更具现实意义的态势上行进。

作为中国整体抗战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战时东南三省的文化运动的使命要求、发展导向、表现形式等，都是服从于抗战总的要求，与整体文化运动保持一致。许杰曾经就文艺运动指出：“东南文艺运动，是整个中国文艺运动的一环；站在整个中国文艺运动的立场说，应该无所谓东南文艺运动；站在文艺运动的立场说，东南文艺运动也应该没有那一点什么特殊，有以异乎整个中国文艺运动。”“只是，东南文艺运动，既是整个中国文艺运动的一环，我们要推动并且发展整个的中国文艺运动，那么，作为中国文艺运动的一环的任何一环，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东南的文艺运动也就非积极起来不可。反过来说，东南文艺运动的展开，也就是整个中国文艺运动的推展的开始，要从事整个的中国文艺运动，东南文艺运动，也是不能忽略的”^②。这里所说的“一环”与“整个”的关系，正是东南文艺运动从属、依附于整体文艺运动关系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也应该是对东南文化运动与抗战整体文化运动的关系的写照。

但这一曾经轰轰烈烈的战争文化版图中的文化运动，一度被人遗忘。曾是战时东南文艺运动重要角色的作家许杰先生生前发表过长篇回忆文章，描述东南文艺运动的发展过程，评价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指出：“东南文艺运动，所涵盖的地域，西起江西赣州，东临浙江海滨，包括安徽的屯溪、福建的永安、建阳、建瓯等地方。东南地区的半壁江山，都有我们的报纸，有报纸就有文艺副刊，也就是东南文艺运动的阵地。”然而，“抗战八年，中国新文学史，或者讲以昆明、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国统区’），或者讲陕北解放区，还有人倡导研究沦陷区的‘孤岛文学’”，唯独不讲战时东南文艺。因而他着重指出：“抗战时期的中国东南地区，在文艺上并不

① 黎烈文：《我们的希望——发刊词》，载《改进》创刊号（1939年）。

② 许杰：《关于东南文艺》，《许杰文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42页。



战火中的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三省的文化研究

是一片空白。东南也有文艺,也有文艺运动。因为没有开发与整理,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块空白尚待“填补”^①。自然,像许杰先生所说的那样,战时东南文化运动的研究,也是一块需要“填补”的重要空白。

^① 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15),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目 录

CONTENTS

- 绪 言** 战争版图中的战时东南三省文化 / 001
- 第一章** “东南半壁”抗战文化群体形成的历史原因 / 001
- 一、历史的遇合：唇齿相连、血脉相通的东南历史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 / 003
- 二、现实基因：全国抗战总态势下“东南一隅”的独特地位与独特的文化聚合 / 009
- 三、时代机遇：东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对稳固的历史保证 / 017
- 第二章** 东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历程与战时文化中心的形成 / 025
- 一、战时东南战争的进程与文化活动的流向 / 025
- 二、三足鼎立、犄角相依的三个文化中心 / 041
- 第三章** 东南抗战文化构成之一：文学创作领域 / 062
- 一、表现抗战到底的小说 / 067
- 二、呼喊民族心声的诗歌 / 081
- 三、歌颂与暴露并重的散文 / 096
- 四、大时代的宠儿——报告通讯 / 110
- 五、迅速崛起的儿童文学创作 / 120

第四章 东南抗战文化构成之二:艺术创作领域 / 127

- 一、深入民众的救亡剧运 / 128
- 二、抒唱时代心律的音乐创作 / 144
- 三、“刀与笔”:以刀笔作投枪的美术创作 / 149

第五章 东南抗战文化构成之三:社会科学领域 / 160

- 一、军事学研究:从国内战场到二战的全面述评 / 163
- 二、政治学研究:以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为中心议题 / 171
- 三、经济学研究:抗战建国的经济体系构想 / 178
- 四、教育学研究:战时教育与教育体制之构想与展望 / 186

第六章 东南抗战文化构成之四:新闻出版领域 / 190

- 一、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战时的艰难与新闻业的中兴 / 190
- 二、在艰难踟蹰中走向繁盛的出版业 / 203

第七章 东南抗战文化的生力军——大众文化 / 219

- 一、深入山野、遍及各地的民众文化 / 220
- 二、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军队文化 / 226
- 三、发扬“五四”文化传统的校园文化 / 230

索 引 / 235

参考文献 / 236

后 记 / 238

第一章

“东南半壁”抗战文化群体形成的历史原因

这是一片丰饶的沃土，繁衍着世代勤劳智慧的华夏子孙，创造出一茬又一茬凝结着华夏文明的灿烂文化；这里也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苦难的人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民族文化精神也在血与火中凝聚、升腾。对于我国东南地区人民来说，抗战，这是一段特别值得记取的历史：历史曾在这里迈过艰难的步履，但文化却闪烁过从未有过的耀眼光华。难怪一位躬逢东南抗战文化之盛的文艺工作者要在战后不久用如此激奋的笔墨去描述它：

让我们来拥抱，来相互的抚慰创伤，也让我们来倾诉别情吧！一位外国的学者曾说过：“中国是一列火车，她的机头永远在东方。”但抗战把她扭转到西边去了，最后的几年中，在地理上，东南甚至被截断，被孤立了起来。

这列车的尾巴，被截断过的尾巴怎么样呢？我告诉你：这儿一样的有着战斗，有着胜利，有着不可低估的胜利！^①

这位作者描述的是战时东南文艺的“一笔流水账”，今天读来不免粗疏，若从总结完整的东南抗战文化的历史经验而言，则尤不能令人满足。然而，甘苦备尝的人们最懂得历史的珍贵，哪怕只翻着历史轻轻地一页，我们从中可以体味到的正是这位文化战士对逝去的岁月，对那一片怀有深情的土地的无比的珍爱。如今，历史的硝烟已经飘散，土积尘封的文化史料越发显露其应有的光泽，如果我们循着这位先驱者提出的话题去追踪、去探寻、去思索，也许正可以逼近东南抗战文化历史的完整描述。

自然，这同样是一段需要艰难跋涉的途程。作为我国抗战时期独立展开的一

^① 周梦江：《战时东南文艺——一笔流水账》，载上海《文联》1卷6期（1946年6月）。

个重要区域文化,东南抗战文化群体的生成与发展,形成独特的文化表现形态,都有其充分的现实与历史条件。因此,要全面把握其诸种特征,就必须首先考察这个文化群体形成的历史来由。

从习惯上说,我国的东南地区应当包括浙、闽、赣、苏、皖诸省,所谓东南文化,也应该是这几个省文化的聚合与总和。然而战时东南文化却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它所包括的区域主要是指浙、闽、赣三省及部分周边地区,其中心活动区域则在三省的接壤地带:浙西南、闽西北、赣东南。如此地域文化生成,既源于抗战时期的区域分割,也取决于当时文化开展的实际状况。

以区域分割言之,由于我国战时东南沿海与内地的交通被敌寇切断,东南数省遂成“孤悬半壁”之势。而在这“半壁”中,苏、皖(包括浙北)已沦为敌占区,基本上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浙、闽、赣三省大部地区故又只能称为“东南半壁”。这两地战争态势不同,文化开展状况自然也不尽相同。在苏皖敌占区,各地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和文化宣传活动仍未中断,尤其是英勇的新四军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抗日文化活动开展颇为热烈。这一块文化区域是自成一脉的。但由于受敌侵占的限制,不独文化活动的规模较小,而且也难以构成同外界密切的联系,在整个东南地区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浙、闽、赣三省大部地区,由于日寇进犯较少,敌人仅把战火烧到钱塘江以北,1942年浙赣战役以后,敌亦仅仅占了金华、兰溪等少量地方,整个区域仍大抵归于平静,因而这里得以较为自由地开展抗日文化活动,它的规模与声势不独影响整个东南地区,也影响全国,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与西南大后方文化遥相呼应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因而这里虽为“东南半壁”,但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产生的文化现象,有资格代表东南文化。

以文化开展的实际状况言之,浙、闽、赣3省的抗战文化活动持续达8年之久,贯串抗战全过程,而且8年来这3省的文化力量均互相交融、互为支持,文化出版物也交相传递,互为影响,因而在时空建构上已形成了一个较为紧密的文化群体。

这个文化群体事实上已成为战时东南文化的象征。其具体表征如:在浙江金华成立的中共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以邵荃麟为书记,冯雪峰、骆耕漠、夏征农、葛琴等为委员),统一协调这3省的文化力量;一批冠以“东南”名义的出版社、文化团体,如《东南战线》、《东南日报》、《东南文化》、《东南文艺》、东南出版社、东南联

合大学等,大抵聚集在这3省境内;更重要的是,早在战争期间,这里就曾提出开展“东南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如在金华的尹庚首倡“建立东南文艺战斗堡垒”的主张,其后又有在建阳的许杰提出“展开东南文艺运动”的倡言,于是在更大规模上开展一个东南抗战文化运动遂成为3省文化工作者的主要兴奋点和同一追求目标,东南文化热潮也由此引向深入。如此说来,把这一地域视作东南抗战文化的主要立足点,是早经历史认同的观念,并非仅仅是后人的概括与总结。

然而,前面确定的东南抗战文化的地域范畴,揭示的仅仅是这一文化运动的外部表征,它可以说明这一运动开展的大致由来,却尚未揭示其生成的内在规律。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战争版图中的东南抗战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恰恰应验了这位伟大先哲的论断。以浙、闽、赣3省为主体的东南抗战文化正是在具备诸种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此种创造乃是东南人民面对历史的无可回避的选择。认识这一点,对于把握东南抗战文化特质是极为必要的。

一、历史的遇合:唇齿相连、血脉相通的东南历史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

文化作为“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②正由于此,探讨一个地域的文化生成,是不可切断历史渊源关系和该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文化传统。我国东南3省抗战文化活动造成如此生动的局面,就可从现实推衍到历史,洞见这里早就形成的文化血缘关系,洞见3省人民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形成的共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因而不妨说,东南抗战文化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② 《大英百科全书》(1973-1974年),转引自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既是抗战这一特定时期的现实性的产物,同时也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

唇齿相连的历史地理环境,当是这一地域文化生成的首要前提。从地理位置上看,浙、闽、赣3省因山脉贯通、河道交汇而融为整体。东北—西南走向的武夷山脉贯穿闽、赣边境,其北端连接由浙西南向闽北延伸的仙霞岭,这一山系将浙、闽、赣3省紧紧连在一起。这里山路相通、河道相连,交通便利,东南沿海以舟船为交通工具可直达内陆腹地,地处最东南端的福建泉州、厦门,可由闽江经富屯溪入赣,再由赣境的信江进入浙江境内与之相邻的新安江支流而进达钱塘江。陆路交通也十分畅达,仙霞岭原为浙闽边境的天然屏障,唐末黄巢起义军进军福建时,开凿仙霞岭,凿开山道七百里,这样可由浙江衢州越仙霞岭直趋福建建州,开辟了浙闽之间的陆路通道。宋时的东南沿海重要商埠泉州,就可从水陆两路通向浙赣:北上南平经由仙霞岭入浙,西北向则可沿富屯溪入赣。地理位置上的相邻相依,交通的便捷、畅达,使得3省人民的交往自古以来就十分密切。由于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的大致相同,更加深了该地人民的血缘联系。浙、闽、赣3省多属平原、丘陵地带,水利资源丰富,这一特定条件,使以水稻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文化特征保持了该地耕作方式的大体一致,制瓷业、蚕桑业、种茶业、渔盐业等等,也是该地发达的产业,一度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尤其是制瓷业,南宋以来全国的陶瓷制作中心南移,除都城临安有官窑以外,民间则有越州窑、龙泉窑、吉州窑、建州窑、景德镇窑等,几乎都集中在浙、闽、赣3省。陶瓷器往往代表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准,陶瓷制地的相对集中,除了说明3个省有渊源很久的文化传统外,也可以看出它们同样具有渊源很久的经济文化联系。

此外,这3省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也有过繁盛的时期。“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这历来是人们对东南地区文化发达的赞语。往昔,文化开发较早的中原地区因战乱频仍,常见衰竭景象,而东南则“财力富盛”。台湾著名学者陈正祥曾著文论述中国文化中心的3次南迁,认为“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在空间上,淮河曾一时成为南北文化的界线”^①。这个论述是有道理的。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人文荟萃,又得东南雄

^①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第5页。

厚财赋之利,遂显一时文化繁荣景观。柳永《望海潮》词描述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就用艺术的笔触勾画了东南人杰地灵、文化发达的景状。此种现象,因东南经济的稳定发展而成一发不可收之势。中国东南自南宋以来,无论哲学(理学)、文学(诗词)、绘画、书籍印刷,都曾独占鳌头。以书版刻印而言,杭州为两宋之冠,且有绍兴、台州、严州、衢州、婺州等多处刻书处,王国维有云:“自古刊板之盛,未有如吾浙者”^①;饶州人洪迈在其《容斋四笔》中曾引嘉祐中吴某所撰《余干县学记》云:“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有人做过统计,明一代的文魁(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计244人,南方人计215人,占88%;北方人仅29人,只占12%。而南方的215人中,仅江、浙、闽、赣4省就高达193人(江苏66人,浙江48人,江西48人,福建31人),几达90%^②。如此空前盛况,谓东南文人学士曾居全国文化要津,恐不为过。正是由于此种文化历史现象的延续,在近现代,东南文化界人才辈出的壮观景象,就毫不足怪。近代自海禁大开以后,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加以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影响,这里的思想、文化界有识之士,率先经受世界近代文明的洗礼,崛起于东南一隅,汇成了一支为国人瞩目的文化新军。单以浙江一省而论,知名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就多至129位^③,而其中属于一二流作家的,也不下数十人,像鲁迅、茅盾,郁达夫、徐志摩、冯雪峰、夏衍、艾青、戴望舒等。有人戏称浙江作家占了将近半部现代文学史,也庶几近之。如此雄厚的文化力量,无疑是为当时开展的东南抗战文化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化的空前发达,必促进文化交流的频繁展开,使省际固守一地的文化局面有所打破。自南宋以来,浙、闽、赣3省因学人汇集,且有地理近便优势,该地文化交流蔚为风气,也可说是开创了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我国古代重要哲学思想——理学在东南诸省的繁盛与交流。理学创于北宋,以二程(程颢、程颐)最为名重。程门弟子多出自南天下,故程颢曾有“吾道南矣”^④之慨。宋

① 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序》。

② 陈正祥:《中国近代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第22页。

③ 浙江省文学学会编:《浙江现代文学百家》,浙江文学出版社1989年。

④ 《宋史·道学二》(卷二四八)。

室南渡以后,理学南移的格局终于形成,而又以浙、闽、赣3省尤为鼎盛,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该地文化思想的繁荣。当时的重要理学学派和理学大师几乎多出于此。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居于福建建阳,升白鹿洞书院讲学,弟子遍于各地,创立了我国理学中的重要一派——“闽学”。理学中的“心学”大师陆九渊居于江西金溪,始于家乡辟“槐堂”讲学,后又在贵溪象山立精舍传道,从学者逾千人,形成了影响广远的“心学”学派。浙江则更是学派林立,学人荟萃。金华时称“小邹鲁”,吕祖谦创“婺学”于此,形成名重一时的“金华学派”。此外又有被称为“事功派”的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这几派组成的“浙东学派”,在我国理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学派众多,反映了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学人间互相辩疑答难风气的形成,遂使文化学术交流成为不可阻遏之势。当时的几位重要理学大师,就经常往来于浙、闽、赣3省传道讲学,其中最能为佳话的则是古代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学术聚会——南宋淳熙二年的“鹅湖之会”,在江西信州(今上饶)鹅湖寺举行,由浙江金华的婺学代表吕祖谦出面邀集,请福建“闽学”代表朱熹与江西“心学”大师陆九渊互相辩难,并由3省众多学者列席。这次聚会,反映了我国东南3省文化力量的聚合与交流有其历史渊源。理学作为一种带有历史局限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其思想和理论价值如何值得探讨,各学派之间的是是非非也暂置不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对闭塞的封建社会里,东南3省有如此活跃的文化活动与文化交流局面,委实难能可贵,这无疑为其后该地学人辈出、形成文化学术思想长盛不衰之势开创了良好的风气。此种风气,不但由宋及于明、清,而且也延伸到近代,延至抗战时期及现在。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说,东南诸省人民还具有强悍的民风,富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反侵略传统。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荆楚、七闽,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那里的人民具有骁勇、刚强的气质,自古以来,就不乏对内反压迫、对外反侵略的优良传统。单以反侵略传统而言,由于东南地处沿海,既得对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之便,同时又往往率先遭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因为殖民主义者的贪婪总是把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海盗式的掠夺结合在一起,被侵略、被掠夺的人民的反抗斗争就不可避免了。史料记载的江、浙、闽3省人民的抗倭业迹,可谓不绝如缕,其中尤值得称道的是民族英雄

戚继光组织、领导浙、闽 2 省人民的抗倭斗争。他招募该地的农民、矿工参军,组建“戚家军”,始而荡平浙东沿海倭寇,继而肃清福建沿海匪患,使危害我国近两个世纪的倭患得以平息,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至近代鸦片战争爆发,东南沿海又首当其冲。一方面是殖民主义者的野蛮侵略,福建沿海成为英国在中国贩毒的第二个中心,浙江沿海的舟山、镇海成为在禁烟以后英军实施疯狂军事报复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是两省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民族英雄林则徐、邓廷桢、葛云飞等组织两省官兵奋勇迎敌,厦门、泉州、宁波、舟山等地人民自发组织的抗英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显示了东南人民在外敌侵略面前不可屈服的意志与力量。这种留在记忆中的历史的耻辱与光荣,对于东南人民来说无疑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由是,当现代“倭寇”再度入侵,而且它对于中国人民的危害程度远甚于以往的“倭患”与鸦片,因而更激起东南人民的义愤与抗争。抗战期间,东南人民就是以先哲前贤的民族精神为楷模,激励意志,投入神圣的抗战事业的。当时的东南文化出版物就把宣传东南历史上的抗敌英雄以激励人民的抗敌精神,作为重要宣传内容。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编辑发行的通俗文化刊物《老百姓》,当时就定期介绍了《两浙英雄故事》、《戚继光平倭寇》、《戚继光撒豆歼倭寇》、《宗泽誓死抗战》等。该刊在颂赞宗泽抗战一文的开篇“新词”中,写了“国民道德重精忠,古往今来一样同”^①。很显然,这是东南人民在相同的抗战事业中找到古今相通的民族精神,东南人民正是从这些历史积淀的民族精神中获取了不竭的力量。

与民族精神在同一精神层面上闪光的,是唇齿相依的东南 3 省人民所具有的光荣革命传统。众所周知,江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革命根据地,在那里点燃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烈火终成全国燎原之势,江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功不可没的历史贡献。而江西的斗争又往往同浙、闽 2 省相倚相连、不可分割。方志敏、刘英、粟裕等领导的闽浙赣边境游击战争坚持数年之久,红军长征以后,这里又成为南方的一处重要革命根据地,革命在此间展开如鱼得水,反动势力虽处心积虑予以扑灭而不可得。这除了 3 省有地理近便关系、

^① 载《老百姓》第 88 期(1941 年 6 月),(金华)国民出版社出版。

边境又地处险要适于游击活动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3省人民的革命要求。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作过这样的分析:“关于闽浙人民,一般地说来,可分为山地和平地居住两种,在山地的农民,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完全同情于游击队的活动;而在平地,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在地主层内,山地可以说没有地主,在平地居住的地主,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同情的。”“有少数大地主,四五百亩地以上的地主们也很同情,关于这些大地主的代表中,在乡村有极大封建势力的什么村长等类的人物也常都是我们的群众。至于说到一些中、小地主,那同情于我们的更不知有多少。”^①这里所述,显系一种相当特殊的状况。包括地主在内的农村各阶层有如此之众支持和同情革命,既源于此地反动势力特别猖獗,以致于人们不堪忍受而奋起抗争;同时也源于主要地处山区而更陷于贫困的人民的本能的革命要求。此种革命要求当然也是东南人民所固有的反压迫的传统精神的延伸,只不过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会爆发出更猛烈的革命火花而已。由此可见,阶级解放要求同民族解放要求总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当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富有反抗精神的人民为谋取民族(也包括自身阶级)的生存,会自觉地将阶级解放要求服从于民族解放要求,把反抗外敌侵略置于首要地位。当日寇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深厚重之际,闽浙赣3省的革命力量所争取的就是这一态度。早在1936年,中共闽浙省委就向全国发出呼吁:“在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国家领土将要完全破裂的当儿,摆在全国大众面前的紧急任务应该是:举国一致坚决抗敌,蜂拥群起铲除汉奸”^②;全面抗战爆发后,闽浙革命武装力量立即组建“抗日红军”,开赴抗战前线,并晓谕各部队:“迅速向军区集中,以期早日对日直接作战,凡所经各地区以国民党驻军及一切地方武装部队,尤宜格外亲善,碉堡电线和各种交通工具务须保护,在共同抗日图存目标下,绝不许有损团结御侮之举动。”^③至此,东南各地

① 《中国闽浙边临时省委关于闽浙人民拥护红军情形的报告》(1937年10月),《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② 《闽浙临时省委告全国民众书》(1936年),《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1937年8月),《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